

风雨 800 年

茶陵古城墙的前世今生

肖淋文

去炎帝陵采风,途经茶陵,车窗外山峦叠嶂,此起彼伏,蜿蜒向天际。这些山有别于湘南常见的丘陵,它们高大,雄伟,像出鞘的宝剑,直插云霄。山峰云雾缭绕,在流动的云层中若隐若现,放眼望去,天地浑然一体,让人感觉到莫名的厚重与大气。

茶陵,因炎帝崩葬于茶乡之尾得名。

陵,在中国的古文化中,一般泛指帝王之墓。拆解来看,阜,大山;菱,攀越,合起来是“攀越大山”,引申后便有“升天通道”的意思。中国帝王之墓大多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背山面水,希望依托山河之势,来让逝者的灵魂得到升华。所以,作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炎帝,崩葬在这莽莽群山之地,实属情理之中。

茶陵县城最有名气的当属南宋古城墙。

茶陵的文化名片

城墙在洣水河畔,我们自古城遗址“迎湘门”而入,漫步在石板路上,越靠近水边,越能感觉到一种扑面而来的宁静。道路两旁都是连片的旧宅、青砖、黑瓦,木质的门窗,加上栏杆式建筑的特征,让人很容易推测出它们应该属于清代,靠近墙上悬挂的文物保护单位牌一看,果真如此。历经上百年的风雨,这些建筑虽然得以完整的保存下来,但岁月落下的尘埃还是让它们充斥着衰败的迹象,加上如今人去楼空的寂寥,在阴霾的冬日中凝结出一层萧瑟的凉意。

石板路、古民居、古城墙,这些元素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当今茶陵的一张文化名片。

茶陵的城墙始建于南宋绍定五年。这一年,北方的蒙古军在三峰山之战中大败金军,对汴京形成包围,金哀宗弃都而逃,金国政权摇摇欲坠,蒙古军队南下之势,让与金国毗邻的整个南宋未雨绸缪;而在国内,湘南暴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起义军数次逼近茶陵,综合来看,在彼时修建城墙应该不是偶然,而是契合了南宋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

茶陵北抵长沙,南通广州,西接衡阳、东邻江西,于西汉(公元 202)年置县,历来都是交通要塞。在古代,商品在陆路流通都会形成固定的线路,如西域的丝绸之路及唐藩古道,而茶陵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成为了后来湘赣茶盐古道的一部分。丰富的流通商品催生了一个古老的职业——山贼,他们不仅抢掠商人的货物,而且经常会进入城镇打家劫舍,所以,修建城墙实际上也是出于百姓安居乐业的实际需要。

城墙由当时的县令兼军事刘子迈负责修建,作为一名七品官员,刘子迈的政治影响相当有限,所以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太多的生平史料。在城墙镌刻的碑文中,当地的史学家描写了与其有关的一些内容,茶陵县城临水而建,在修筑城墙时,刘子迈集思广益,一是在城外开挖沟壑引入洣水,形成凭江为险,以濠为堑,据城而守的军事防御体系;二是以修建城墙为契机,构筑以堤护城,以城防洪,以濠泄洪的防洪体系。这种军民两用的设计思路,淋漓尽致展现了古代人民的生存智慧。

城墙上的风景

拾阶而上,立于城墙,视线豁然开朗,四面八方的光线和风像潮水般汇聚而来,顿时给人一种凌于高处的畅然。来不及细看远处的风景,忙不迭将视线收近,细细打量起脚下的城墙。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城墙作为防御工事,几乎是大城市的标配设施,在南京、西安、苏州等很多城市,现在都还保存着比较完整的遗迹,它们除了材料上略有区别,式样都大同小异,比如:都是“井”字型结构,以东、南、西、北设置若干道城门,城门之上是飞檐式建筑风格的城楼,城楼除了能够烘托出城门的威严与庄重,也是值班将领的休息、办公场所;城墙之上垛垛相连,便于士兵隐蔽击杀攻城的敌军;而隔空相望的诸多敌楼则是用来贮存武器和用于士兵休息。

茶陵古城墙和我们从电视里看到的并无两样。墙体则由青砖构成,墙面光滑而又整洁,这令我感到很诧异,几个世纪过去,无论是自然的风雨侵袭,还是战争的炮火硝烟,都应该会在墙上留下摧残的印迹,然而,我并没有看到。

经历史考证,茶陵古城墙原有 3353 米,大部分毁于崩塌、战火和洪灾,如今我们看到的 484 米城墙是历经数次修整后的产物;而且最初城墙的材质不是青砖,是由巨大的条状紫砂岩石堆砌而成。

遥望四周,发现县城地势平坦,土质松软,这石料又从何而来?

她用手指了指远处的云阳山。

光阴悄然而逝

在人类进入蒸气时代之前,大型石料的开采与运输都是一项异常艰辛的事情。放眼世界,无论是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长城,还是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城墙,这些巨大的石砌建筑都拥有一个血腥的建造过程,那些由战俘、囚犯、奴隶组成的建造队伍,每天都在重复着一个令人发指的内容,那就是用生命换取石头,用源源不断的白骨为不断拓展的工程进行奠基。

所以,在这些雄伟建筑的背后,都隐藏着无数悲惨的怨灵。

这时候,茶陵县委宣传部的张老师给我们请来了一位老先生,介绍说老先生祖上八代人都生活在城墙边,当年之事经祖辈口口相传,虽然年代久远,也无半分遗漏。他退休以后,因为对古城墙拥有深厚的感情,已在城墙边义务讲解了 18 年。

这种热爱和坚持,令人顿生敬意。

老先生衣着简朴,神色安详。相互颌首后,他便娓娓道来一些与城墙有关的历史典故。他的普通话带着浓厚的茶陵口音,让人听起来十分费解,但经仔细聆听,还是能够略懂几分。

他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县令兼军事使刘子迈是一个忧国爱民的官员,口碑极佳,辖区内数万百姓纷纷响应号召,前来参加工程建设,只用时一年有余,城墙便顺利竣工。



这让人很意外,原以为,这段城墙说不定也是南宋横征暴敛的产物,哪知结果截然相反,政通民和的建设背景让我对这段古城墙陡然增添了几分好感。

在城墙上缓慢行走,一个又一个墙垛循序渐退,墙下的洣水静静流淌,这些流动的物体,让我想到了时空的迁徙。

800 年的光阴,应该就是这般悄然而逝。

倚着城墙,轻扶墙垛,将目光逐渐放远,思绪轻扬中,似乎能料想到当年,这墙上排列着披坚执锐的士兵,手中的武器,在阳光下折射出凛冽的寒意;带队的将领在城墙上来回踱步,将系于腰间的长剑握了又握,警惕地注视着洣水对岸广袤的田野、河面上来回穿梭的木船;城墙下,满载货物的马车缓缓而过,“得得”的蹄声震碎了晚霞。

南宋的夜色落下来,一切都归寂于历史,只剩下一堵厚重的城墙,横亘在河岸,向人们无言诉说着那年、那月、那时光……

▼远观城墙上的角楼,似乎能料想到当年,这墙上排列着披坚执锐的士兵,手中的武器,在阳光下折射出凛冽的寒意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vzhv83@163.com

株洲往事

醴陵历史上的那些会馆

刘放年

会馆是明清时期都市中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民间团体,大体分为三种:有供科举之士居停聚会之处,称为“试馆”;以工商业、行帮为主体的同乡会馆;由客民建立的同乡移民会馆。

醴陵是移民县,也是通商口岸。因此这里的会馆基本都属于同乡会馆和移民会馆。醴陵的会馆有设于醴陵以外的,更多的设于醴陵城内。

设于醴陵以外的主要有“醴泉堂”,位于汉口。在汉口设有长沙会馆(建于清道光年间),醴陵居第一厅。会馆坐落於汉口董家巷,规模宏大,中有戏台。民国十四年,湘乡的曾某会长私自将第一厅出租,致醴陵人愤慨不已。傅熊湘、陶澍吟等据理力争,将租户斥退,正名醴泉堂。同时还在汉口河街建有“萍醴码头”,并设公所,谭延闿曾撰联云:“萍水相逢,主宾皆美;醴泉不竭,江汉同流”。此外还有民国初年设于长沙的“醴陵驻省同乡会”等。

历史上醴陵几次移民大迁徙,所剩的土著很少,移民大多来自江西、福建、广东。到民国时期,醴陵城内还设有豫章会馆、福建会馆、广东会馆。城郊还有福建围、江西义山等。

豫章会馆,又名万寿宫,设于老城原西后街,明代西帮(江西)创建。内祀许圣真君。民国志载:“凡赣人落拓于醴者,资以川资,病给医药,死无所归者,则畀以棺槨”。位于城南郊的“江西义山”便是他们建的公墓陵园。此外设于白兔潭、美田桥等会馆有十六家。

福建会馆,又名天后宫,设于原汤家巷。清道光二十九年,由闽帮(福建)所建,祀天后(福建林氏女)。清末并设有崇实学校。还在王仙、浦口、神福港等设有会馆。

广东会馆,又名南华宫,设于原育婴街。祀六祖慧能。清乾隆中叶,由粤帮(广东)所建。时县令黄圣之撰联云:“作尹槐花封,喜是间水绿山青,定有人才夸玉笋;抚时刚嘉熟,问诸君酒余茶后,可曾诗梦忆珠江”。民国初年并设培元女子学校。在王仙、枫头洲、泗汾设有小学。

会馆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和商帮文化发展的产物,它作为乡谊联系的纽带,是寄居他乡的商人自我构建,自我认同的精神象征。

会馆文化至今还在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近些年,醴陵在进行老城改造的规划与建设时,会馆也列入其中。



民国时期,设于汉口的长沙会馆,醴陵会馆“醴泉堂”设在第一厅。

地名文化

株洲地名背后的历史印记

云鹏

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既有历史之渊源,亦含文化之传承。

手头有一本 1997 年版的《株洲市志》,闲来无事随手翻阅,发现株洲有几个地名背后深深镌刻着这座城市悠长而厚重的历史印记。

火把冲的“火把”

“火把冲”位于今天株洲荷塘区果木园一带,也就是现在的株洲市工业学校和湖南工业大学东校区那一片区域。火把冲的“冲”在湖南方言里指的是“山区的平地”,所以从地名我们就大致可以判断这里地势相对平坦,而且周边会有山丘环绕。

《株洲市志》记载,“火把冲”在历史上是醴陵到长沙的必经之路,因为长沙和醴陵的商业联系非常密切,商贩络绎不绝,运送货物的马车来往不断,巨大的人员流动让这个地方成为了一个十分繁华的小商埠。

谈到“火把冲”名字的由来,要从 160 多年前的太平天国起义说起。1852 年 9 月,太平军北上攻打长沙正是选择了这条交通要道。为了便于行军时的指挥和联络,太平军兵卒手里的火把照亮了整个天空,随手丢弃即将燃尽的火把时却意外地引燃了附近的莲花山。这把大火烧了整整七天

七夜,也就是从那时起,这个地方被当地人称为“火把冲”。

凿石浦与庆霞寺

凿石浦,又名凿石埠,区域大致相当于现在天元区湘水湾和楚天花园。凿石浦曾经建有一座著名的庆霞寺。据《凿石浦志》记载,庆霞寺始建于唐贞观元年(公元 627 年),香火曾经一度十分的旺盛。

唐大历四年(公元 769 年)仲春,大诗人杜甫溯湘江而上,途经凿石浦。因为被凿石浦秀丽的风光所吸引,杜甫让船家早早停船,准备留宿在凿石浦边上的庆霞寺。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大诗人站在湘江边,春天的湘江是美丽的,江面上渔帆点点,长天里沙鸥翔集,近看花红柳绿,远眺村落俨然……看着眼前的一切,诗人的心情难得地愉悦起来,和煦的春风也慢慢抚平了他紧锁的眉头,一丝笑容爬上他沧桑的面庞。真是一片大好春光,大好江山啊。

夜深了,在庆霞寺的孤灯下,伴着悠长的钟

声,杜甫轻声吟诵出了这样的诗句:“早宿宾从劳,仲春江山丽。飘风过无时,舟楫敢不系。回塘澹暮色,日没众星曜。缺月殊未生,青灯死分翳。穷途多俊异,乱世少恩惠。鄙夫亦放荡,草草颇颓岁。斯文忧患馀,圣哲垂家系。”

暮年的杜甫是凄苦的,面对国家的变乱,他悲苦郁积,难以释怀,但面对凿石浦的绝佳景致,诗人吟出了“仲春江山丽”这样优美的诗句,可以想见闪过他心头的那份轻松与欣喜。仅以此而论,凿石何幸,株洲何幸啊!

《凿石浦志》记载:南宋时,书法大家米芾钟爱杜甫的诗文,曾沿着当年诗圣的足迹溯湘江而上。在凿石浦,米芾曾挥毫写下“怀杜崖”三字,遗憾的是,如今,凿石的庆霞寺和怀杜崖石刻早已湮灭无存了。

芦淞区的由来

东汉建安二十年(公元 215 年),孙权在此设建宁县,作为株洲发祥地的芦淞区就此发端。1997 年 5 月 31 日,国务院批准株洲市在南区的基础上设立芦淞区,因为该区的政府所在地设在芦

淞路,故命名为“芦淞区”。

芦淞两个与抗战有关。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8 月 13 日淞沪会战爆发,在此期间大量涌入的难民让株洲的商业和手工业出现了繁荣。1937 年 9 月至 1939 年 9 月,日寇对株洲进行了多次轰炸。为阻断日寇南下进攻,国民党军队拆毁了当地一座桥梁。1941 年,大桥修复。为了牢记历史,修复者从“卢沟桥事变”和“淞沪会战”中各取一字,将新修复的铁路桥命名为“芦淞桥”,而毗邻的街道也就被称为“芦淞街”了。

资福寺

天元区江边有一座非常气派的寺庙,那就是资福寺。历史上的资福寺原址并不在此,而在今天的芦淞区解放街。

《湘潭县志》中对资福寺有这样的记载:“资福寺在株洲,田册四亩”。《株洲市志》的记载则更为详细:“资福寺在株洲市南湖街 79 号,据传为梁武帝时建造。”该寺自建造以来,一直香火旺

盛。1918 年,株洲资福寺观音堂在南北战争的战火中焚毁;1944 年 6 月 16 日,株洲沦陷于日寇之手,资福寺住持峨眉法师奔走岳麓;50 年代后期,资福寺遭受致命的破坏,佛像被运走,两壁碑刻被取出铺地,佛殿被改作住房;1964 年,资福寺为株洲市镜花厂租用,后被改为株洲市低压开关厂员工宿舍。因年久失修,资福寺破败不堪。1998 年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资福寺迁往天元区重建,气势大胜往昔。

株洲资福寺何以在历史上如此有名呢?这要从南宋名将刘锜的一次造访说起。据《湖南县志》记载,绍兴 25 年(公元 1155 年)刘锜被任命为潭州知府,加太尉。在任期间,刘锜来到株洲资福寺,寺中住持见他器宇轩昂龙行虎步,就再三叩问姓名。刘锜一语不发,挥毫在寺中的墙壁上写下“迅扫妖氛六合清,匡中宝剑气犹横,夜观星斗鬼神泣,昼会风云龙虎惊。重整山河归北地,两扶圣主到南京,山僧不识英雄汉,只管滔滔问姓名”的诗句,然后一语不发掷笔而去。当僧人们得知这位访客就是刘锜时,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

湘江无声流淌,城市日新月异。伴随着呼啸而去的高速列车,人们对这座城市历史的记忆也变得日益模糊,但那一个个古老而又鲜活的地名却依然在诉说着这座城市那或喜或悲的故事。